



十三行学术丛书

广州十三行

历史人文资源调研报告

冷东 赵春晨 章文钦 杨宏烈 著

广州新华出版发行集团

广州出版社



十三行学术丛书

广州十三行

历史人文资源调研报告

冷东 赵春晨 章文钦 杨宏烈 著

广州新华出版发行集团

广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广州十三行历史人文资源调研报告 / 冷东等著. —广
州: 广州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 - 7 - 5462 - 1181 - 7

I. ①广… II. ①冷… III. ①十三行—调查报告—
广州市—清代 IV. ①F752. 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83010 号

书 名 广州十三行历史人文资源调研报告

Guangzhou Shisanhang Lishi Renwen Ziyuan Diaoyan Baogao

出版发行 广州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 87 号 9、10 楼 邮政编码: 510635)

<http://www.gzcbs.com.cn>)

责任编辑 康 燕

责任校对 蒋美秀

封面设计 李帧涛

印 刷 广州市怡升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横江 邮政编码: 511400)

规 格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开本 1/16

印 张 24.25

字 数 450 千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462 - 1181 - 7

定 价 6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十三行学术丛书》编委会名单

主编 赵春晨 冷东

副主编 章文钦 谭元亨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楚坚 刘晓明 陈伟明 李庆新

杨宏烈 冷东 赵春晨 章文钦

谭元亨

《十三行学术丛书》

总序

赵春晨 冷东

关于广州十三行，明末清初诗人屈大均曾有诗云：“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广州竹枝词》）写的是当时广东中外贸易繁盛和十三行财富充盈的景象。其实，作为鸦片战争前长期经营中外贸易、充当中西交往桥梁的十三行，不单只是物质贸易繁盛和财富的象征。20世纪研究十三行的著名学者梁嘉彬写道：“研究十三行者往往泛论其对外贸易而止；余考知西洋文物之传入除由贸易得来者可以毋论外，其若西洋楼台、炮台、战船诸物之建造，西洋医术之介绍（郑崇谦之传种牛痘，伍崇耀之设立眼科医院可以为证），欧美外情之采访，甚至近代银行事业之仿行，中外货币之倾融兑换，莫不以十三行为其嚆矢。”（《广东十三行考》）吴晗先生更从明清历史演变的大视角上立论道：“从‘锁国政策’到‘五口通商’，在这两个最大的转变契机上，广东十三行是一个重要的枢纽。”（《评梁嘉彬著〈广东十三行考〉》）可见在十三行存续的一个甚至两个多世纪里（十三行起于何时学术界尚无定论，故而其存续时间不定），其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和所发挥的作用，实在要广泛和深远得多。鸦片战争前的一两个世纪当中，对于正纷纷东来的西方人而言，

十三行是他们与中国贸易和交往必须通过的中介及桥梁；而对于正面临世界一体化大潮的国人而言，它则无疑是中国开始接触与融入世界的一个起点。鸦片战争后，十三行垄断中西贸易的制度被废除，十三行商馆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完全焚毁，从而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十三行仍是一项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文化遗产，它为中国留下了大量具有历史文化内涵的遗址、遗物与精神的财富，也为世界留下一条连接东方与西方的历史文化的纽带。这一切，都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去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去开发利用其资源。

有关十三行的学术研究，早在 20 世纪前期已经开始，广东学者梁嘉彬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于 1937 年出版的《广东十三行考》（南京国立编译馆初版）一书，成为此项学术研究的奠基性作品。此后陆续有一些国内外学者继续致力于此项工作，使得十三行研究绵亘不断，至今已经成为具有国际性的研究领域。但是就国内而言，自 20 世纪 40 年代以后，由于多种原因，研究工作几乎停顿数十年之久，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后才得以恢复。而且因为研究力量的分散、资料发掘存在难度，以及文献研究与资源现状调查、开发利用的规划设计缺乏密切配合等原因，研究工作迄今尚未有大的突破，不仅就学术而言，尚未能从总体上超越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的水平，而且在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上，也缺乏全面的规划与设计，这显然是不符合当代社会发展和学术进步需要的。

有鉴于上述情况，在广东省和广州市领导的关心和学界朋友的支持下，广州大学于2009年组建成立了“广州十三行研究中心”，并被批准为“广州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我们组建这个专门研究机构的目的，在于为国内外学者提供一个进行学术研究、开展学术交流的平台，推动对于广州十三行这一历史文化遗产的系统、深入研究，并借助对于这一重要历史文化遗产的挖掘，为广州乃至整个国家的文化积累和现代化发展作出贡献。“广州十三行研究中心”成立后，根据上级领导和学界朋友的期望，致力于组织和开展十三行的学术研究、十三行资料信息的汇集和收藏、十三行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沟通与联络广州十三行后裔等，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编辑出版这套有关十三行的学术丛书。

我们深知，十三行研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必须立足广州，面向全国，面向世界，进行多角度、多语种、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吴晗先生在20世纪就曾提出：“研究这问题有几种困难应该克服，第一是史料的搜集，所有各种文字中关于这问题的记载，尤其是中文材料，都应一一加以研究和批评。第二是实地的采访，除文字的记载以外，还应从行商的后人和父老的传说中采访遗事，和文字的记载互相印证比较。第三是历史的研究，除横的方面就十三行本身作研究外，因这制度和中国历代市舶制度有关，更须向上追溯，作一纵的探讨。”（《评梁嘉彬著〈广

东十三行考》》) 我们期望，通过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集学界各位同道之力，能够在上述史料的搜集、实地的采访、历史的研究几个方面有所收获，同时，能够在充分调查研究基础上。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全球化的宏观视野审视十三行历史人文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在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战略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通过科学的规划与开发。使十三行历史文化资源能够更好地为今天的经济、文化建设服务。

这套丛书定名为《十三行学术丛书》，就内容而言，包含着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收入本丛书的，应是与十三行有关的作品，范围包括十三行的制度、行商、中外贸易双方的情况、中西文化交流、相关历史背景、文化资源遗存、研究状况等等；一是这些作品应是学术性质的，即属于研究专著、论文集、资料汇编与翻译等，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就形式而言，既云“丛书”，自然是由多部作品构成，但是由于我们的研究工作是逐步进行的，所以不可能在短期内同时推出，需要陆续编辑和出版，希望读者予以谅解。同时，在整套丛书编辑出版过程中，我们殷切希望读者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及时予以修正，提高丛书的质量。

(赵春晨系广州大学广州十三行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教授；冷东系广州大学广州十三行研究中心副主任、历史学教授)

前 言

近年来广东省市主要领导多次发出指示，要求加强十三行的研究，为岭南文化研究和文化强省建设多作贡献，十三行已经成为具有浓厚广东地方历史文化特色的重点研究领域。广州市也将十三行列为广州六张名片之一，十三行成为广州培育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资源。

十三行研究也是广东特有的学术遗产。20世纪以来有关十三行的研究在广东学者中首发其端，曾产生过像梁嘉彬的《广东十三行考》（1937年初版）这样的学术名篇。但是20世纪40年代以后，由于多种原因，研究工作几乎停顿了三四十年之久，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才得以恢复。近年来，广东省政府和文化、学术界对十三行的有关研究颇为重视，已经开展了若干活动和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由于研究力量较为分散、资料发掘存在较大难度，以及文献研究与资源现状调查、开发利用的规划设计缺乏密切配合等原因，研究工作至今尚未有大的突破，就学术而言，尚未能从总体上超越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的水平，在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上，也缺乏全面的规划与设计，这显然是不符合当代广东社会和学术发展需要的。更重要的是在评价十三行的历史地位上学术界分歧明显，批评者认为十三行是“闭关自守”的产物，与世界历史发展背道而驰，牺牲了其他沿海区域的利益，阻碍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与鸦片走私有密切关系，是鸦片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行商“传及三代，堕落不堪”等。赞扬者认为十三行代表中国走向海洋的历史趋势，开启了中国了解世界、学习西方的历史进程，体现了岭南文化交融进取的特点等。可见，如何评价十三行的历史地位，既关系十三行和岭南文化研究的深入，也涉及中国近代化进程和中外关系的分析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因此，对十三行的历史发展脉络、人文资源价值、研究和开发利用现状进行系统的调研与总结，摸清十三行人文历史资源的“家底”，对明确今后研究工作的方向和重点，系统开展深入研究提

出全面性思考与建议，供政府有关部门和文化界、学术界参考，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十三行研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资源规划开发等领域，因此本成果是由各有专长的作者分工进行、集体完成的。调研报告具体内容分工如下：

第一部分：十三行历史概述，章文钦教授负责；

第二部分：十三行文化遗产，赵春晨教授负责；

第三部分：十三行研究状况，冷东教授负责；

第四部分：十三行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杨宏烈教授负责；

附录一：十三行人文历史研究资讯中的相关资料，由赵春晨教授与杨宏烈教授整理及撰写；

附录二：十三行研究中文论著目录索引及内容提要，由冷东教授完成；
冷东教授对全文进行了通稿润色。

本成果的不足之处主要是受条件限制，海外（包括港澳台）的资料收集及提要介绍会有疏漏，海外文物的掌握及线索尚未全面，对相关成果的分析评论也许有失公允全面，不当之处衷心希望得到学界的指导批评，今后继续补充完善。

感谢广东省社科规划办公室的大力支持，本项目得以立项为2009年广东省社科规划地方历史文化特色项目，并在2011年顺利结项。感谢广州市委宣传部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为本书提供了广州市宣传文化出版资金资助。感谢广州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细致工作，使本成果得以问世。我们将继续进行广州十三行的研究工作，为广东文化强省建设和广州世界文化名城建设作出更多的贡献。

广州十三行历史人文资源调研报告课题组

2012年10月

目 录

总 序	(1)
前 言	(1)
第一部分 十三行历史概述	(1)
一、起源与沿革	(2)
二、规条与制度	(6)
三、影响与局限	(12)
四、著名行商家族	(19)
第二部分 十三行文化遗产	(27)
一、遗址	(28)
二、遗存建筑及石刻	(30)
三、享誉世界的外销器物	(33)
四、珍藏大内的宫廷“洋贡”	(36)
五、原始档案文献	(38)
第三部分 十三行研究状况	(43)
一、学术史回顾	(44)
二、“广东十三行”还是“广州十三行”？	(85)
三、研究队伍状况	(98)
四、学术发展趋势展望	(113)
第四部分 十三行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	(123)
一、十三行文化资源的特征与稀缺性	(124)
二、坚持科学规划，悉心保护历史街区	(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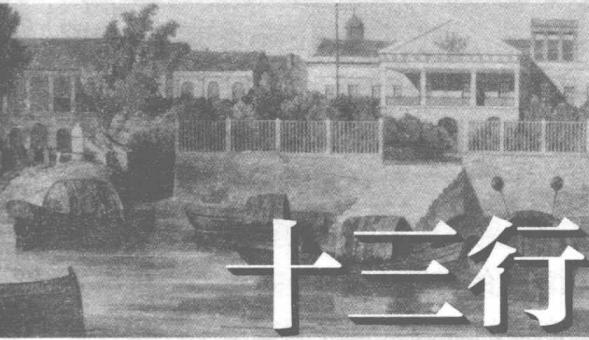
三、展示遗产魅力，大力进行旅游开发.....	(131)
四、建立十三行专题博物馆.....	(136)

附录一：十三行人文历史研究资讯 (140)

一、行商名录.....	(140)
二、1825 年后之夷馆名录	(144)
三、商馆区历史地图 (5 幅)	(146)
四、著名行商园林比较表.....	(151)
五、欧美各地藏中国外销通草纸水彩画部分机构一览表.....	(152)
六、关于复原行商园林海山仙馆的构想.....	(154)
七、关于树立十三行历史雕塑景观的构想.....	(162)

附录二：十三行研究中文论著目录索引及内容提要 (169)

凡例.....	(169)
一、收录范围.....	(169)
二、编辑体例.....	(169)
上编：著作.....	(170)
中编：论文.....	(176)
下编：参考资料.....	(226)
一、著作.....	(226)
二、论文.....	(257)
三、影视文学.....	(300)
目录索引.....	(305)
著者索引.....	(341)



第一部分

十三行历史概述

十三行是历史上出现在广州而具有全国乃至世界影响的事物，本部分拟从起源与沿革、规条与制度、影响与局限及著名行商家族等几方面，对十三行的历史作一概述。

一、起源与沿革

广州是中国一个具有悠久的对外贸易与交往传统的港口城市，秦汉之际已成为南方一大都会。至晋南北朝，当南海市舶首冲。唐置市舶使，宋设市舶司，历元明而不替，十三行的历史正是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关于十三行的起源，梁嘉彬先生认为与澳门开埠有密切关系。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广东海道副使汪柏立客纲、客纪于广州。客纲类似后来的保商，客纪类似行商属下的买办。^① 据葡人方面的记载：“这时中葡间的商业，却一步一步地走上繁荣的路径，在一个月内，由广州卖出的胡椒达40000斤，商人所购买的为上日本去转售的货品达100000葡金。商业的利源，是被原籍属于广州、徽州、泉州三处的十三家商号垄断着。”^② 在十三家商号中，有广商五家、泉商五家、徽商三家。至于何以为十三家，大约当时前来广州贸易者有十三国，一行专与一国贸易。这大约就是十三行的起源。十三行的名称，首见于屈大均《广州竹枝词》：“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载《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纱缎》）《广东新语》初刊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可知在此之前已有十三行之名。清朝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海禁，次年设粤海关于广州。这首诗描写了海禁初开，中国商船争相前往东西二洋贸易的历史性场面。

彭泽益先生则认为，在设立粤海关的次年，即康熙二十五年（1686），广东巡抚李士桢发布《分别住行货税》的文告，将当时参加贸易的商行分为金丝行和洋货行两大类，分别交纳住税和行税。其布告称：“省城、佛山旧设税课司，征收落地住税。今设立海关，征收出洋行税，地势相连，如行、住二税不分，恐有重复影射之弊。今公议设立金丝行、洋货行两项货店。如来广省本地兴贩，一切落地货税，分为住税，报单皆投金丝行，赴税课司纳税；其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分为行税，报单皆投洋货行，候出海时，洋商自赴关部纳税。诚恐各省远来商人，不知分别牙行近例……除关部给示通饬外，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省城、佛山商民牙行人等知悉：嗣后如有身家殷实之人，愿充洋货行者，

^①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23、第45页。

^② （法）裴化行著，萧浚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第94页。

或呈明地方官承充，或改换招牌，各具呈认明给帖。即有一人愿充二行者，亦必分别二店，各立招牌，不许混乱一处，影射蒙混，商课俱有违碍。此系商行两便之事，各速认行招商，毋得观望迟延，有误生理。”^①这就将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分别开来，为清代广东洋行制度创设之始。^②

由此看来，十三行之名盖起于明代，其经营对外贸易的传统亦沿袭明代，其性质同属官设牙行，而清代广东洋行制度的创设则始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洋货行后称外洋行，即十三行；其承充者称洋货行商、外洋行商，简称行商、洋商，即十三行商。据彭泽益统计，从康熙五十九年（1720）至道光十九年（1839）纳入统计的38个年份中，共有行商404家或421家，行商最多年份为乾隆二十二年（1757）的26家，最少年份为乾隆四十六年（1781）的4家，通常行数为10~13家（占20个年份），实数为13家的有嘉庆十八年（1813）和道光十七年（1837）两个年份。^③

当粤海设关之始，来舶无多，税饷亦少，所设之十三行行户亦不过数家。至康熙三十八年（1699），英船“麦士里菲尔德号”（Macclesfield）至澳门，颇受中葡官吏之欢迎，粤海关监督受总督之命亲自下澳，率同商牙、差役人等丈量船只，并愿减其原定课税四分之三以示招徕。又有原为尚可喜所任命之“王商”Hunshunquin者，亲诣英大班道格拉斯（Robert Douglas），愿以最高之价收买，以最低之价售卖，自此中英贸易始有长足进步。

其后广东海洋贸易日盛，牙行商人之权势随之日长。从事贸易的官商，各有其背后实力为奥援。除原为“王商”的Hunshunquin外，复有受总督所任命者，称为“总督商人”，在广东商人中其势力有超过“王商”之趋向；受将军所任命者，称为“将军商人”；受巡抚所任命者，称为“抚院商人”。当“麦士里菲尔德号”抵粤时，除四大官商外，其他私家商人竟无一敢擅与之交易。

至康熙四十一年（1702），广州、厦门两处突有所谓“皇商”者出现，在广州方面，当地官商Leanqua告英大班云：“此皇商昔为盐官，以欺瞒朝廷，中饱盐税，曾被逐出省外，然彼卒能贿通权要，以四万二千两巨款进于皇储，而取得欧西贸易之包揽特权，朝廷原未知其事，而彼亦无存货与订购货物之合约，但恃势凌人而已。”四十三年（1704），英船四艘抵粤，其中三艘俱拒绝与“皇商”贸易，而秘密与五家官商订立交易合约。这些官商曾贿通海关监督，故敢与“皇

^① （清）李士桢：《抚粤政略》卷六《文告》，（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出版。

^② 彭泽益：《清代广东洋行制度的起源》，载《历史研究》1957年第1期。

^③ 彭泽益：《清代广东洋行制度的起源》，载《历史研究》1957年第1期。



商”对抗。“皇商”以独揽权被官商所夺，向总督申诉；官商以“皇商”资本及信用不尽充实反诉。经总督调查，俱与官商所陈诉者相符，而英商亦坚持贸易不能任“皇商”一人专揽，“皇商”最终让步，允许官商在赔偿损失的条件下参与贸易。“皇商”凡历二年而败。^①

康熙五十四年（1715），共有外船20艘停泊黄埔、澳门，内有法国船6艘，当时英、法、荷诸国船只争相来粤贸易，联合谋航路之公开。其后广州商业日趋繁盛，而当时中国市场银根紧缺，英商已有放债与行商之事。

康熙五十九年（1720），行商组织公行。据马士（H. B. Morse）所载，是年由最著各商在神前宰鸡啜血，共同盟誓，举行隆重仪式，并制订行规十三条，裨十六家行商共同遵守。其要点如下：为防止夷商买贱卖贵，各行商应与夷商相聚一堂，共同议价，有单独议价者应受惩罚；他处或他省商人来省与夷商交易，本行应与之协订货价，以期卖价公道，有自行订定货价或暗中购入货物者罚；货价既经议妥，货物应力求道地，有以劣货欺瞒夷商者罚；自夷船卸货及订立装货合同时，均需先期交款，以后并须将余款交清，违者处罚；夷船欲专择某商交易时，该商得承受该船货物之半，另一半须由其他行商摊分，有独揽全船货物者罚；行商中对公行负责最重及担任经费最大者，在外洋贸易中占一全股，次者占半股，其余占四分之一股；占一全股之头等行五家，占半股之二等行五家，占四分之一股之三等行六家，新入公行者，应纳银一千两为经费，并列入三等行内。^②

组织公行之目的，盖在于本着公平迈进之精神，使“行商有一公平严密之组织，商人彼此间不致再互相排挤而使外人独享其利，亦不使行商肆行欺诈而使外人独受其害”^③。

实际上，每一次组织公行，皆有广东大吏为之背后实力。公行组成后，共同订定进出口货价，增强行商的团结力和对外商的约束力，深为外商所忌，被英公司称为“悬在大班头上的一把达摩克里斯（Damocles）之剑”^④。英商不断从中破坏，收买个别行商，贿赂官吏，使公行屡设屡废。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

^① 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 1.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26: 102, 104, 138 – 145.

^② 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 1.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26: 163 – 164;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84~87页。

^③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87页。

^④ 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 2.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26: 33.

同文行商潘启官（Puankhequa I）以英公司支付的10万两银贿通总督，解散公行。到四十七年（1782）复设公行时，其作用仅限于对进出口货征收行佣，以供官府临时差科及赔还倒歇行商所欠税饷和外商债款之用，公行已名存实亡。

随着广州商业日趋繁盛，粤海关权力日趋膨胀，监督家人看管口岸，任其额外苛求；海关旗员多有额外加派，苦累商民。外船来粤，船有“船钞”，货有“货税”，正税之外，有通事费、买办费，又有3%到10%的附加税。依照粤海关则例，其外船进口，自官礼银起，至书吏、家人、通事、头役止，共有规礼、开舱、丈量等名色三十条；又放关出口，书吏人等验舱、放关、领牌等名色共三十八条。乾隆十九年（1754），官府更令以后凡外船之船税、贡银、行商与通事之手续费、出口货税、朝廷搜罗珍品等事，俱由行商一二人负责保证。次年，复重申行外商人参与外国贸易之禁。^①因此行商地位愈益巩固，而责成愈重，外商则愈感受压迫。

外商以广州贸易屡受压迫，转而往厦门、宁波等处贸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经两广总督奏准，加征浙海关关税，上谕专限广州一口与西方商船贸易，由此开始了长达八十余年的广州一口通商时期。行商地位更大为增强。

乾隆二十五年（1760），同文行潘启官等九家行商呈请设立公行，专办欧西货物，得粤海关监督准许，嗣后洋行遂分外洋行、本港行、福潮行三项名目，外洋行商人乃不兼办暹罗等国及潮州、福州诸货税。外洋行之分设与专办欧西货物，反映了自18世纪中叶起以英、法、荷等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对广州的贸易居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后英国建立印度殖民帝国，英国在广州口岸中西贸易中迅速跃居最重要的地位。乾隆四十九年（1784），美国船“中国皇后号”（China Empress）首次进入广州贸易，其后美国对华贸易迅速发展，在广州口岸中西贸易跃居第二位。外洋行的设立，适应了广州口岸中西贸易迅速发展的趋势。由此行商责成愈专，官府课税亦愈重。每有一行商倒闭，又须连累通行，嗣后行商倒闭破产不能完纳官府课税者迭出。

行商倒闭破产的另一面，是无力偿还外商债务而形成商欠。据乾隆四十四年（1779）英人记载谓：“行商破产之一部分原因虽由于骄奢淫逸，无可避免债务之桎梏，然根本原因则在饱受政府大吏之苛敛勒索所致。是时行商接受外资及货物总共数目不出1078976元，然此时英债权人所提出之债项，约截至本年年头止，连同复利竟达3808076元之巨。该项债款几全为早与英公司有商业关系之

^① 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 1.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26: 296—297.